

谈“五四”时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

孙党伯 陆赅东

关于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仅就其中一个目前有争论的问题，即当时鲁迅的进化论思想，略抒管见。

一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和主将鲁迅，在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场出发，怀着为人民大众谋解放的目的，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取同一步调，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彻底的批判，建立了丰功伟绩。对于鲁迅的这一伟大历史功绩，大家都一致首肯；但鲁迅当时的宇宙观，或者说他使用的思想武器是什么呢？人们的回答不一。有的同志认为，主要依凭无产阶级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作为思想武器。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鲁迅当时的宇宙观，主要是进化论，虽然进化论并不能概括“五四”时期鲁迅的整个思想。

我们先列举一点事实。

鲁迅“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他实践的产物和思想的结晶，它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的最重要的依据。只要浏览一下鲁迅这时的著作，就会发现，许多篇章十分明显地呈露着作者的进化论思想。

论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主要以进化论作依据，来阐明怎样做父亲，批判封建的“孝”道。作者说：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达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这，读者一看就明白，无需加以分析。

杂文《随感录·二十五》称赞“‘人’的萌芽”，“完全的人”，并说“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四十》颂扬“人之子醒了”，知迎爱怜，发出了呼声。作者说：“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这两篇，实际上是根据进化论的宇宙过程和伦理过程理论，来评论人的。

在《四十一》中，作者说：“人猿同祖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义了。但我不怪，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证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

这一篇启示我们：鲁迅对尼采的超人没有完全否定，是由于他误以为超人也体现了人类进化的理想。

《四十九》以高等动物的“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这一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要求人人“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六十一·不满》说：“人类尚未长成，人迎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而“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迎前进。”还是从民族（种族）进化的角度提出问题。

《六十二·恨恨而死》说改造社会的步骤是：“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六十三·与幼者》之传“对于一切幼者的爱”。《六十四·有无相通》的议论：“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百罢！”这里，还是用进化论关于人和社会互助的观点来看问题。

《六十六·生命的路》，更是从人类（生命）进化总是要“跨过灭亡的人们向前进”的观点，来看部分人的死亡的。

上述篇章表明，鲁迅当时对人、对家庭和对国家民族的看法，主要是进化论的观点。

对于人的认识，鲁迅在“五四”时，还不能从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彼此间结成的关系中去认识，还不能从阶级社会中的人的本质——阶级性——上去把握它。他以为，人本来是好的，向上的；后来，因为社会和旧的思想、文化、道德、习惯的影响，精神上背着因袭的重担，所以就落后了。一九三五年，鲁迅追述“五四”时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的便是后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外篇小说集）小引》）尽管鲁迅当时已认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下等人和上等人，而且确证“下等人胜于上等人”，认识到有压迫者与被迫者，吃人的人和被人吃的人。但因他没有掌握阶级分析观点和方法，所以不能将这两种人加以严格区别，例如在《狂人日记》中，把佃户也标做是吃人的人。

正因为鲁迅主要是用进化论观点分析问题，所以在谈到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的步骤时说：“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他把人主要看成是单个的人，以为单个的人都改造了，社会就好办了。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人是社会的人，阶级的人，只有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才能改造自己。鲁迅后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问题的提法也就不同，他说：“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

对于家庭，鲁迅在“五四”时主要也是从进化论的以幼者为本位的观点出发，批判封建思想、道德。他说，“总括大忌，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思想、道德的意义上说，这无疑是美好的愿望。但家庭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紧密联系着，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不改变，所谓“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就不可能实现，即使一些人“解放了自己的孩子”，那专少年一代也会象被绑着同时又被笼子关着的小鸟，松了绑，它仍然不能飞出笼子。

和上面两个问题相联系，是对国家、民族（或种族），鲁迅在“五四”时也较多的是用

进化论关于宇宙过程和伦理过程的理论进行考文，往往是从“国民性”民族“根性”的角度提出问题。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谈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传况时还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

鲁迅从来不隐晦他曾相仪过进化论。后期，当他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已历程时说：“我一向是相仪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专年必胜于老人”。大革命失败，“目睹了同是专年，而分成两大阵营”的事实，“思路因此轰毁”。又说，感谢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仪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鲁迅在这里明确地说他过去“只仪进化论”。

我们不应去否定鲁迅自己确认了的事实，而应当面对事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具体的分析。

二

既然鲁迅“五四”时期的宇宙观主要是进化论，那么，他是全盘接受，还是有所吸取有所扬弃有所增益呢？如是后者，那么，他吸取了什么、扬弃了多少、增益了那些呢？

大家知道，进化论是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创立的。它唯物地解释了生物界的进化发已。列宁称赞它“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说它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进化论给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创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包含着错误的成分，他只承认物种进化中的渐变，否认飞跃；他说他的生存竞争学说是应用于全部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学说。达尔文的这一方面，我们应按照恩格斯的下述指示去评价：这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所共有的缺点”（《反杜林论》）。

应该指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利用达尔文的错误，来鼓吹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这是不应由达尔文来负主要责任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同这些反动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鲁迅接受进化论不是从直接阅读达尔文的著作开始，而是首先阅读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亡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朋友和仪徒，他热情宣传和勇敢捍卫了进化论学说，同宗教徒及唯心主义学者已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并战而胜之。《天亡论》是他晚年的著作，较系统地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原理。当他用进化论解释自然现象时，是唯物的，正确的；而在分析人类社会时，则把伦理过程、精神力量看成是社会发已的主要原因，并把伦理过程、精神力量看成是独立于社会存在之外的东西，这就带有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但是，必须指出，他虽然说过下面一段话：

“社会中的人，无疑是受宇宙过程支配的。正如其他动物那样，繁殖不断地进行，并为寻求生存资料而进行激烈的斗争。生存斗争使那些比较不能使自己适应于他们生活环圉的人趋于灭亡。最强者和自我求生力量最强者趋于蹂躏弱者。”（《进化

然而他接着强调这种宇宙过程随着社会发巳，所起的作用愈小。所以并不能据此判定赫胥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天亡论》的总的倾向还是反对和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我们有些历史著作，在谈到《天亡论》时，有的说赫胥黎“用生物的自然竞争来代替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本质上是反动的，它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国近代史》）有的说《天亡论》的下半部“把生物学的科学原理错误地套用到社会领域，是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哲学史简编》）。这不仅是苛求于前人，而且是对赫胥黎的曲解。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胡说人类中存在着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鼓吹“择种留良”的反动理论。赫胥黎与之相反，断然宣称：“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严复《天亡论·导言十五最旨》）他认为，“把进化原理应用到人类社会来的严格的科学方法，是很难用于实际的政治领域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他又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习惯于图谋主动或被动地灭绝人们当中的弱者，不幸者和多余者，他们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辩护，自称这是宇宙过程所批准的，是保证种族进步的唯一途径；假如他们坚持下去的话，必然会把医学列入妖术中，而且把医生看作是不适于生存的人的、恶意的保护者；在他们撮合婚姻时，种马繁殖原则产生了主要影响；因此他们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培养抑制自然感情和同情心的高贵技艺。”（《进化论与伦理学》）他还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穷的贫民和被定了罪的犯人既不是最弱者，也不是最劣者。”

赫胥黎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有两种法则，一是如同生物界一样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法则，他把这称为“宇宙过程”，严复译为“天行”；一是人的道德、情感、思想、良心的进化，他把这称为“伦理过程”，严译为“治化”。在人类社会初期，“宇宙过程”占支配地位。“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继续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进化论与伦理学》）用严复译述的话来说，是“德贤仁义，其生最优”，“治化进而天行消”。赫胥黎提倡“与天争胜”，相仗人力可以胜天，“转害而为利”；他特别强调启发民智、民德。

鲁迅接受进化论是从学习《天亡论》开始的。因此，他所理解的进化论，带有《天亡论》所阐明的内容的特点。但是，鲁迅并不是照搬达尔文的或赫胥黎所宣传的进化论，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了进化论的主要部分，自己又将它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第一，鲁迅在早期就认为“世事之长，有动无定”（《坟·文化偏至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五四”后，他更进一步指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坟·写在〈坟〉后边》）他把进化看成是一种前进的向上的持续发展过程，“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基于此，他称崇“幼者本位的道德”，很早就树立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观点；并给了他和顽固守旧势力及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斗争的力勇、决心与勇气。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鲁迅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是曲折前进的，但存在着突

变飞跃。在早期，他就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政体的改变，并不是都要遵循由专制而立宪到共和这一渐进的公式，有的国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集外集拾遗·中国地质略论》），可以由专制经过革命而实现共和制。到了“五四”时期，鲁迅的全部著作和实践都表明，他全力以赴的，是希望在中国实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坚仪：“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他千方百计地“助其变迁”。这说明，鲁迅已经超出了进化论的发展观的范畴，或者说他克服、弥补了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缺陷。达尔文否认自然界有飞跃，庸俗进化论者否认社会发展中的飞跃、质变。鲁迅既承认进化，又承认飞跃，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与庸俗进化论者相反，不把进化和革命对立起来，而是从进化的观点出发理解革命，欢迎革命，推动革命发展。鲁迅在前期，往往把革命看成是一种合乎发展规律的进化。五四时期，他把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看成是进化的正常现象。到一九二七年，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还说：“其实‘革命’是并不希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把社会的革命变革同生物的进化变迁等同起来，显然是不科学的，但鲁迅用生物进化的道理来说明实行社会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却证明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不仅不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相对立，而且把两者看成是一致的。这也是鲁迅在“五四”时期虽然相仪进化论但能听从无产阶级“将令”，以及后来在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下认识了进化论的偏颇便能迅速掌握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重要原因。

第二，鲁迅认为一切事物在其发展进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在“五四”时期，鲁迅所说的矛盾、斗争，主要是指旧与新、吃人者与被吃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斗争。他说：“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又说：“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热风·四十九》）同时，鲁迅又清醒地认识到，事实是有些老人“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热风·四十九》）他在“五四”时写的《热风》等著作中指出，旧势力是很顽固的，不但不会自行消灭，而且极力排斥、打击、摧残新的力量。新旧势力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只有进行反抗、斗争，扫除旧的势力，才能前进。“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热风·四十六》）“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热风·六十一》）

在这一问题上，鲁迅对进化论作了重要的改造。从纯进化论的观点看来，优胜劣败，强存弱亡，是合乎生物进化的规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污蔑劳动人民和弱小民族是竞争中的“劣败者”。鲁迅很早就反对这种谬论。他始终站在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被侵略被欺侮的弱小民族一边，反抗强敌。他断定上等人已经腐败，无可挽救，必将灭亡；下等人虽然有很多很严重的毛病，但尚有疗救的可能。他还认为，弱小民族只要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毛病，敢于正视现实，不自满，不自暴自弃，有革命理想，有确信，坚持斗争，就一定能摆脱被压迫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鲁迅这种从进化论那儿取来又加以改造的关于新旧斗争的观点，在“五四”时期有很大的革命性，它同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是一致的。不过，新旧斗争的概

念毕竟失之含混笼统，鲁迅当时还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去作科学分析，往往把青年与老人、子与父、媳与婆的矛盾，看作是新与旧的矛盾斗争的重要内容。

第三，鲁迅认为，阻碍或推动社会进化的诸因素中，主要是精神，是伦理道德。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赫胥黎关于伦理过程的理论对鲁迅的影响。鲁迅在分析中国衰败的原因时说：“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坟·我之节烈观》）。这旧帐指的是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他认为，封建的伦理道德，是“退化的病根”；在中国，“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指愿意子孙更进步——引者）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既然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是使中国落后腐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回答“怎么办”时，鲁迅也就强调要清除这些旧东西。必须“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旧道两派的文书）”（《热风·三十八》）。中国人要想不被“从‘世界人’中挤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热风·三十六》）。鲁迅还说过：“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集外集·渡河与引路》）把改良人的思想，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位的重要任务。

鲁迅这时显然过分夸大了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化中的作用。但是，他特别强调和重视思想革命，大力批判旧思想，热情宣传新思想，宣传科学和民主，这不仅同“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内容完全一致，而且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

我们说“五四”时期鲁迅的宇宙观主要是进化论，可能有的同志会问：进化论在“五四”时还有进步性乃至革命性吗？鲁迅在“五四”的宇宙观主要是进化论，他能充当文化革命的主将吗？

我们认为：鲁迅“五四”时的进化论思想，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革命作用。其原因，一是由于鲁迅坚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庸俗进化论，与他们严格划清了界限，鲁迅所取的是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合理的内核，并且对进化论的某些谬误作了改正，从而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相通或很接近。例如关于事物经过新陈代谢向前发展的观点，毛主席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又如，鲁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中有渐变，也有飞跃；一切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始终存在着矛盾、斗争，这些观点，虽然同马克思主义属于不同思想体系，但观点本身和马克思主义相一致或很接近。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认为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观点，就是两种宇宙观。而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是符合辩证法的。

鲁迅在“五四”时主要以进化论作思想武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服务，起了革命作用，原因之二是，当时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反对关于发展、进化、斗争的学说的。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的总的进程相反，害怕现状的变革，因而在哲学上很自然地主张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近百年来输入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资产阶级不满于封

建地主阶级，又害怕革命，所以拥护庸俗进化论；地主阶级害怕任何变动，所以封建复古主义者反对所有进化论，《学衡》派的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中，拚命反对“文学进化”论，就是一例。

进化论在“五四”时尚可起一定作用问题，我们还可从毛主席谈个性解放中得到启发。个性解放本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为反对宗教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提出来的。但它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仍有积极作用。毛主席曾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论联合政府》）由此可见，进化论、个性解放这些东西，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仍可起进步作用。

那么，进化论就没有给鲁迅以局限性和消极影响了吗？事实不是这样。进化论给当时鲁迅的思想的局限和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不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联系中，正确解释思想、文化、道德、风习等等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社会发展规律；与此相联系，他虽然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却不能正确估计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力量，虽然认为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却不明确通过什么道路使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虽然对未来寄托着希望，但不明确革命的前途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五四”后，鲁迅的认识有进展，最后解决是在一九二七年思想发生质变后。

是否因为鲁迅“五四”时期的宇宙观主要是进化论，他就无法充当“五四”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五四”文化革命的性质、内容和特点谈起。“五四”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革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当时，只要反对老八股老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就可以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战士。而鲁迅当时，是在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进行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这就决定了他有可能成为“五四”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将。其中是否接受无产阶级领导、是否彻底反帝反封建，实质上是一个方向问题。能否充当旗手，这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条件。我们还应看到，在“五四”时，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极少，他们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对整个运动（包括文化革命）的领导，大力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的任务，实际上是由听从无产阶级“将令”、和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取“同一步调”，最勇敢最坚决地向敌阵进攻，最忠实最热忱地为人民大众而奋斗的鲁迅，来承担旗手和主将的角色。

我们还应看到，“五四”时期，在新文学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郭沫若、茅盾和陈独秀，都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毛主席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反对党八股》）由此可见，那时许多领导人物，都未掌握马克思主义。

鲁迅在“五四”时的宇宙观主要是进化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鲁迅是“五四”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将，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正确地理解；而不应改变客观事实，以“证明”我们的观点。